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新动向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严少华 李炳萱

〔内容摘要〕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进一步崛起是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最受关注的现象之一。与上一次大选相比,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并对欧盟政治生态和内外政策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其主要发展特征包括:欧洲整体右倾,右翼民粹政党不仅获得更多支持,其政策主张亦被主流政党吸纳;右翼民粹政党更多倾向于在欧盟内部改造欧洲,采取跨国合作的方式以推进符合本国利益的议程。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主要包括利用负面经济感知宣扬务实经济政策,利用社会分裂挖掘移民议题的身份文化叙事与社会福利叙事,利用社交媒体获取青年选民的吸引。随着欧盟政治轴心的整体右转,如何与欧洲右翼民粹力量打交道成为中国对欧政策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欧洲右翼民粹崛起将对中欧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并带来新的变化。中国应增强外交灵活性,独立看待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精准把握不同立场诉求,在务实合作中促进共同发展。

〔关键词〕 右翼民粹主义 欧洲议会选举 中欧关系

〔作者简介〕 严少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炳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4-0111-20

2024年欧洲进入新的选举周期,其中2024年6月6日至9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尤其受到关注。在疫情复苏、俄乌冲突以及巴以冲突等多重危机的背景下,这场关键性的选举被视为欧洲政治的“风向标”,不仅重构了当前欧盟层面的政治图景,也正在反向塑造成员国层面的政治格局。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主流中间派政党保持了稳定多数的席位,但右翼民粹政党的持续崛起和欧洲

政治轴心的总体“右转”仍然给欧洲政治带来了值得关注的变化。在特朗普重新执政的背景下,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所揭示的右翼民粹主义上升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强化。为什么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会在 2024 年的欧洲大选及此后的选举中呈现持续崛起的态势?这将对中欧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致力于在总结当前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崛起新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其原因与影响。

一、当前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特征与趋势

202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见证了右翼民粹政党的新一轮发展。传统上,尽管既有研究仍然缺乏对右翼民粹主义的一般定义,但普遍来看,右翼民粹政党综合了右翼政党的本土主义特征与民粹政党“人民—精英”对立的话语叙事。^①同时,在欧盟框架内,由于深化欧盟一体化进程与发展国家本土主权之间的限制性关系,欧洲的右翼民粹政党被广泛认为具有“疑欧主义”的特性。与传统右翼民粹主义相比,当前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体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新特点。

(一) 整体右倾:极右政党“主流化”与主流政党“极右化”

欧洲整体呈现右倾趋势,一方面体现在右翼民粹政党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在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盟 27 国选民的投票明显向右转。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巩固了其作为最大党团的地位,与 2019 年相比增加了 13 个席位。聚集了各国右翼民粹力量的欧洲爱国者党与欧洲保守与改革者党在经历了改组后分别是欧洲议会的第三与第四大党团。^②相比之下,即使欧洲议会议员席位数整体增加了,中左翼党团复兴欧洲、社会主义者和民主进步人士联盟以及左翼政党绿党的席位数依旧有所减少。

欧洲议会的选举本质上仍然是 27 个独立的国家选举。从成员国层面来看,右翼民粹政党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取得的进展尤为显著。尽管在欧洲议会大选

① Reinhard Heinisch, Emanuele Massetti and Oscar Mazzoleni, eds., *Populism and Ethno-Territorial Politics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64 ~ 87.

② “EU Election Results,” Reuters, 2024, <https://www.reuters.com/graphics/EU-ELECTION/RESULTS/klvynzzawpg/>.

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在国事访问中与德国共建应对右翼力量崛起的“法德轴心”,但两国执政党在选举中依然遭受了冲击。法国右翼民粹政党国民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其得票数为马克龙所在的复兴党的两倍。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得票数位居该国第二,仅次于中右翼政党,并击败了时任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得票率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四倍,达到28.8%,是该国得票最多的政党。^①考虑到欧洲议会的席位分配方式为基于成员国人口的渐进比例代表制,右翼民粹政党在德国、法国与意大利这三个人口最多成员国内的崛起,也促成了其在欧洲议会内的席位数量取得优势。

另一方面,整体右倾还体现在主流政党与中右翼政党在近年来不断吸纳部分极右翼的政策主张,以保持选民基础并维持政治稳定,本次议会选举更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在移民政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欧盟层面,欧洲人民党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大量吸纳极右翼的政策立场,在大选前两个月主导欧洲议会通过了《移民与庇护协议》,将移民问题定位为安全威胁。^②国家层面,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措施,提议将寻求庇护者重新安置到所谓的“安全第三国”。^③这一政策转变与一贯主张关闭边境并实行严格移民控制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相似。事实上,尽管欧洲议会选举与直接决定国家议会组成和领导人的国内选举不同,但这种“次级选举”不仅是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更被视为对执政党及现任政府信任的投票,为现任政府提供了新的政策指向。^④

此外,本次议会选举中,主流政党首次公开讨论了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与极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2024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https://results.elections.europa.eu/en/>.

② Armida van Rij et al., “How will Gains by the Far Right Affec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EU,” June 11,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4/06/how-will-gains-far-right-affect-european-parliament-and-eu>.

③ John Kampfner, “This Really isn’t Angela Merkel’s Center Right Anymore,”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2,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2/12/germany-cdu-merz-merkel-afd-migration/>.

④ Karlheinz Reif and Hermann Schmitt, “Nine Second-Order National Election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8, No. 1, 1980, pp. 3 ~ 44.

右翼民粹政党合作。^① 由于需要与其他党团合作以获得欧洲议会内的多数席位,并支持冯德莱恩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人民党曾在选举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寻求与由右翼民粹政党意大利兄弟党主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者党达成合作;该党主席曼弗雷德·韦伯提出与极右翼合作的三项原则是“支持欧洲、支持乌克兰、支持法治”。虽然欧洲人民党最后选择与中左翼党团合作,但其与右翼合作原则的公开列出仍具象征性意义。并且,欧洲保守与改革者党已获得两个欧洲议会事务局副局长与三个议会委员会主席的席位。

极右政党“主流化”与主流政党“极右化”所带来的均衡,形成了欧洲整体右倾的社会政治生态。这事实上印证了极右政党的叙事逻辑,即极右翼崛起的原因是民众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而不是极右翼政党的自我宣传与标榜——因为“主流”政治家们同样也在试图回应这些需求。这也引起了学者对何为“主流”的重新界定。既有研究对主流政党的定义通常强调其意识形态定位与选举表现。例如“主流政党被定义为政治光谱中中左翼、中间和中右翼集团中在选举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②又如“如果一个政党的选举吸引力基于可识别的温和的意识形态纲领,而不是基于其领导人的个性或极端言论,则该政党被归类为主流政党。”^③然而,在极右政党“主流化”与主流政党“极右化”的背景下,学界正在尝试重新定义“主流”。例如,将其定义为“政治光谱或公共领域中的核心位置,即政治、媒体和公共背景中视为可接受或合法的事物。”^④由此看来,主流政党的“极右化”与极右政党的“主流化”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过去几十年来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生态中所确立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并且正在被重新定义。

(二) 策略转变:从“脱欧”到在内部改变欧盟

右翼民粹政党总体上持疑欧主义态度,强调国家主权和本国利益优先,反对欧

① Max Becker and Nicolai von Ondarza, “Divided but Dangerous: The Fragmented Far-right’s Push for Power in the EU after the 2024 Elections,” October 1, 2024,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4C44/>.

② Bonnie M. Meguid,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3, 2005, pp. 347 ~ 359.

③ Grigore Pop-Eleches, “Throwing Out the Bums: Protest Voting and Unorthodox Parties after Communism,”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2, 2010, pp. 225 ~ 256.

④ Katy Brown, Aurelien Mondon and Aaron Winter, “The Far Fight, the Mainstream and Mainstreaming: Towards a Heuristic Framework,”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28, No. 2, 2023, pp. 162 ~ 179.

盟权力的扩张,因此传统的右翼民粹政党时常打出“脱欧牌”以吸引选民。但在英国脱欧之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策略发生了变化,它们更倾向于选择留在欧盟内,从内部改造欧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欧洲右翼民粹的崛起并不会导致主流舆论担心的欧盟的解体,而更可能是促进欧盟的改革。

传统研究将疑欧主义区分为反对欧洲一体化方向的“硬怀疑论者”和反对欧盟具体政策路径的“软怀疑论者”。^① 但近期研究成果表明,当下的右翼民粹政党正在摒弃这种僵化的定义与方法,采取了杂糅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即反对“民主赤字”的欧盟。^②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结果也同样说明,“欧盟”并非遭到了右翼民粹力量的拒绝,而是被呼吁重新定义。这不仅是单纯的反欧情绪作祟,更是重新定义欧洲身份的复杂要求。

首先,这体现为欧洲议会内部两个新极右翼党团的成立及其“重塑欧洲”的诉求。本届欧洲议会大选之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所在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简称青民盟)与奥地利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等,将原身份与民主党改组成立为欧洲爱国者党,并与随后加入的法国国民联盟一起主导了这一极右翼党团。欧洲爱国者党的创始文件强调,现在的欧洲由不透明、不合法的官僚机构所主导,它试图用一个“欧洲超级大国”来取代由民族国家构成的欧洲。因此欧洲爱国者党要做的并不是放弃欧盟,而是“夺回我们的机构,重塑欧洲政治”。^③ 与之类似的是“主权欧洲国家党”,这一党团由因“亲近俄罗斯”而被逐出原党团身份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等成立。与欧洲爱国者党的措辞非常类似,主权欧洲国家党同样批判欧盟缺乏透明度与过度官僚主义的日益集权,强调将维护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民主、自由且繁荣的欧洲。^④

① Paul Taggart and Aleks Szczerbiak, “Contemporary Euroscepticism in the Party System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ndidate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3, No. 1, 2004, pp. 1 ~ 27.

② Duncan McDonnell and Annika Werner, “Differently Eurosceptic: Radical Right Populist Parties and Their Supporter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6, No. 12, 2019, pp. 1761 ~ 1778; Richard McMahon, “Is Alt-Europe Possibl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Counternarrativ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 30, No. 1, 2022, pp. 10 ~ 25.

③ Patriots for Europe, “A Patriotic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Future,” June 30, 2024, <https://www.vlaamsbelang.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7/Manifesto.pdf>.

④ Europe of Sovereign Nations, “Political Program,” <https://esn-party.eu/political-program>.

其次,越来越多的右翼民粹政党正在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执政党,这意味着右翼民粹政党可以通过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等国家间机构获得更进一步的影响力。目前欧洲保守与改革者党团中的意大利兄弟党、欧洲爱国者党团中的青民盟与荷兰自由党均是相应成员国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最大党,奥地利的自由党与西班牙的“呼声”党也预计将在下次全国大选后成为执政党。^① 2024 年 9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布了新一届欧委会成员提名名单,包括任命来自意大利极右翼政党的拉斐尔·费托作为六位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之一。^② 这标志着右翼民粹力量在欧盟委员会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赋予其从内部塑造欧盟相关政策的机会。

最后,这也与右翼民粹政党在执政后的温和化倾向有关。^③ 来自意大利兄弟党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来自荷兰自由党的党魁海尔特·维尔德斯在胜选后都降低了反欧盟的调门。例如,在处于反对派地位时,梅洛尼时常表达对欧盟以及欧盟政策的厌恶;但是执政之后,其态度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施意大利国家恢复和复原计划的过程中,梅洛尼政府热衷于与欧盟保持良好关系,将问题归咎于“不积极配合欧盟”的上届政府,与欧盟机构进行多次谈判以寻求解决意大利国家恢复和复原计划实施困难所需的一切途径,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和有组织犯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政党被传统主流政党所同化,意大利兄弟党依旧主张带有国家保护特性与减损欧盟权限的经济政策。

(三) 跨国合作:以“跨国”推进“本土”议程

右翼民粹政党对本土主义的强调往往被视为他们难以达成跨国合作的标志,但是这一陈旧的刻板印象与现实发展并不相符。^④ 近年来,欧洲右翼民粹主

① Max Becker and Nicolai von Ondarza, “Divided but Dangerous: The Fragmented Far-Right’s Push for Power in the EU After the 2024 Elections,” October 1, 2024,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4C44/>.

② Paula Soler and Vincenzo Genovese, “Hard-Right ECR Group Gets Powerful EU Commission Post, Stirring Parliament,” Euronews, September 17, 2024,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4/09/17/hard-right-ecr-group-gets-powerful-eu-commission-post-stirring-parliament>.

③ Cas Mudde, “The 2024 EU Elections: The Far Right at the Poll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5, No. 4, 2024, pp. 121 ~ 134.

④ Duncan McDonnell and Annika Werner, *International Populism: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30.

义的发展逐渐超越了国内政治层面而呈现出跨国化和欧洲化的倾向。如今大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政党和组织保持着跨国联系。尤其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以法国国民联盟和意大利兄弟党为代表的欧洲右翼民粹力量改变以前各自为战的风格,开始在欧洲层面走“串联”和结盟之路,试图以松散的议题联盟方式推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和重塑欧洲政治格局。这种跨国互动立足于各国右翼民粹政党在本国国内发展的内在诉求,也受益于技术层面跨国网络传播的发展。^①

一方面,通过跨国合作,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层面推进更多有利于本土化的政策主张。例如,梅洛尼在移民问题上仍持强硬立场,并认为欧盟已经越权,但他表现出了与欧盟其他国家合作的意愿,力求在欧盟层面上通过对反移民有利的政策。^②事实上,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千差万别,各国右翼民粹政党基于本国利益而制定的政治纲领亦各不相同。反移民的政策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显著一致的合作领域。^③

另一方面,右翼民粹政党以跨国合作的方式寻求更为主流的认同,试图在不改变实质政策纲领的情况下完成在本国国内的“去极端化”。事实上,阻碍右翼民粹政党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一直是各政党之间战略与政策的不一致性,而不是意识形态、制度或领导人的个人特色。^④在可行的情况下,右翼民粹政党充分利用国际合作来打破其在国内的政治孤立。例如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前夕,法国右翼民粹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多次向梅洛尼发出信号,邀请后者在欧洲议会中一同组建一个庞大的右翼集团,并将自身塑造为“主流保守派”;^⑤与此

① 严少华、李炳萱:《论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合作:以匈牙利和美国为中心的考察》,《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第158页。

② Barbara Moens et al., “A Meloni-Le Pen Super Group? Not So Fast,” Politico, May 28,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ar-right-super-group-european-parliament-giorgia-meloni-marine-le-pen/>.

③ Rosa Balfour and Stefan Lehne, eds., *Charting the Radical Right's Influence on EU Foreign Polic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24, pp. 1 ~ 18.

④ Cas Mudde, “The 2024 EU Elections: The Far Right at the Poll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5, No. 4, 2024, pp. 121 ~ 134.

⑤ Barbara Moens et al., “A Meloni-Le Pen Super Group? Not So Fast,” Politico, May 28,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ar-right-super-group-european-parliament-giorgia-meloni-marine-le-pen/>.

同时,梅洛尼方面也在寻求与更具影响力的欧洲人民党进行合作。^①

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新一轮崛起的原因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是欧洲经历了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巴以冲突等重大危机后的首次大选,危机的发展及过去数年间欧盟出台的应对政策对各成员国内部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带来了双重挑战。

作为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确定本届议会的优先事项为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增长及限制移民。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 3 条与第 4 条的规定,与经济议题相关的竞争规则、货币政策、能源政策,以及移民政策与社会政策等属于欧盟专属权能或共享权能,是欧盟有权进行立法的实质领域。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也进一步体现在能源政策、移民政策与社会政策等方面。因此,除去政治立场上的表述,各政党在欧洲议会内进行竞争的实质政策领域集中在经济议题与移民议题上。

然而,这两大政策领域与右翼民粹政党的关系各不相同,也分别给后者带来不同的挑战。在经济议题上,主流政党的政策与极右翼政策保持了一贯的距离。在经历新冠疫情后,欧盟推出“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以帮助成员国恢复经济活力,并着重推进欧盟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进程。^②到 2024 年欧洲议会大选前夕,欧盟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受俄乌冲突影响而一度飙升的通货膨胀水平也进一步降低。^③理论上,经济衰退是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的重要基础。但是在本次大选中,即使经历多次危机,欧盟经济也没有出现绝对数据上的显著衰退,这是右翼民粹政党在经济议题上面临的重要挑战。

① Mared Gwyn Jones and Sandor Zsiros, “Europe’s Centre-right Keeps Door Ajar to Populists amid Far-right Surge,” Euronews, March 8, 2024,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4/03/08/analysis-europes-centre-right-keeps-door-ajar-to-populists-amid-far-right-surge>.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Recovery Plan for Europe,”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recovery-plan-europe_en.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Spring 2024 Economic Forecast: A Gradual Expansion amid High Geopolitical Risks,” May 15, 2024, https://economy-finance.ec.europa.eu/economic-forecast-and-surveys/economic-forecasts/spring-2024-economic-forecast-gradual-expansion-amid-high-geopolitical-risks_en.

在移民议题上,主流政党很大程度上吸纳并实现了极右翼的政策主张。例如,欧洲人民党主导通过的《移民与庇护协议》充满了民粹主义的话语,且支持了其竞选活动。欧洲人民党在关于移民与庇护的立场文件中将“人民”定义为“欧洲公民”或“我们的公民”,并用安全化的方式论述移民问题。^① 这一融入了身份政治的言论从2020年《移民与庇护协议》进入公众视野后,便反复被欧洲人民党用作其政治宣传工具。^② 因此在本次欧洲议会大选中,传统的极右翼反移民政策及话语已经被主流政党占据,这是右翼民粹政党在移民议题上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

在这两种挑战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调整叙事与策略,实现了进一步的崛起。首先,在经济议题上,右翼民粹政党基于民众对经济的负面感知而非数据上的经济衰退,提出基于本土利益的实用主义经济纲领。第二,在移民议题上,右翼民粹政党将其塑造为主流政党“失败”的象征,并利用因巴以冲突等加剧的欧洲社会撕裂,在传统移民主张上深挖其文化身份叙事与社会福利叙事。最后,在策略层面,右翼民粹政党对社交媒体的运用更为灵活,尤其是在青年选民中提高了得票率。

(一) 经济感知:面向本土的实用主义政策

理论上,经济衰退会促进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在欧洲,既有研究同样表明,生活在受到全球化负面影响地区中的个人,更倾向于将他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满转化为对欧盟的不信任和对疑欧政党的支持。^③ 但是在本轮选举时,欧盟的经济并未出现绝对数据上的衰退。相比之下,群众对经济前景的负面感知构成了右翼民粹力量提出其经济政策纲领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右翼民

① EPP Group, “EPP Group Position Paper on Asylum and Migration,” February 1, 2023 https://www.epp-group.eu/newsroom/epp-group-position-paper-on-asylum-and-migration_42fa8ed.

② Katharina Diebold, “EP Election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pu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EU,” June 16, 2024, <https://www.populismstudies.org/connection-between-populism-and-identity-politics-in-the-european-union/>.

③ Camilla Lenzi and Giovanni Perucca, “People or Places that Don’t Matter?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the Geography of Discontent,” *Economic Geography*, Vol. 97, No. 5, 2021, pp. 415 ~ 445; Dani Rodrik, “Why Does Globalization Fuel Populism? Economics,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13, No. 1, 2021, pp. 133 ~ 170.

粹政党对绿色新政、俄乌冲突等议题,提出了基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务实主张。

近期研究表明,经济衰退与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强调感知的基准测试理论在解释欧洲普遍存在的政治不满情绪方面越来越受欢迎,它强调纵向或横向比较对象(基准)的不同会为个体带来不同的现实感知,进而转化成不同的政治满意度。^① 纵向上的感知包括民众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会增加个体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力度;^②横向上的感知则包括欧洲核心国家中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本国较富裕的地区心怀不满,而边缘地区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则对欧盟较富裕的国家心怀不满。^③ 因此,尽管当下欧洲经济并没有出现绝对数据上的衰退,但纵向上的负面未来感知与横向上的地区分配问题构成了右翼民粹政党的经济议题获得民众支持的基础。

纵向上的负面未来感知与大部分右翼民粹政党的“反建制”特征相符。近年来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受到疫情相关供应限制以及俄乌冲突后能源价格冲击的影响,通货膨胀率被推高至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④ 2024 年 5 月,尽管欧盟委员会将欧洲经济描述为“在高地缘政治风险中的逐步复苏”,预测欧元区 2024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0.8%,^⑤但这一数字仍不到疫情暴发前五年平均水平的一半。正如欧洲委员会所述,尽管欧洲存在经济增长的潜力,但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等不确定性让选民们难以对经济有乐观的估计。根据欧洲晴雨表的调查,飙升的物价与宏观经济形势分别是促使公民在本次选举中投票的首要 and 次要因素。^⑥

① Anders Ejrnæs et al., “Introducti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Discont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31, No. 6, 2024, pp. 1465 ~ 1493.

② Giray Gozgor, “The Role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in the Rise of EU Populism,” *Public Choice*, Vol. 190, No. 1, 2022, pp. 229 ~ 246.

③ Dominik Schraff and Jonas Pontusson, “Falling Behind Whom?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31, No. 6, 2024, pp. 1591 ~ 1619.

④ Luis De Guindos, “The Economic Outlook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Euro Area,” January 10, 2024,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4/html/ecb.sp240110~caba85ba4.en.html>.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Spring 2024 Economic Forecast: A Gradual Expansion amid High Geopolitical Risks,” May 15, 2024, https://economy-finance.ec.europa.eu/economic-forecast-and-surveys/economic-forecasts/spring-2024-economic-forecast-gradual-expansion-amid-high-geopolitical-risks_en.

⑥ European Parliament, “EU Post-electoral Survey 2024,” October 25, 2024,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3292>.

横向上的地区分配问题则更直接地契合了右翼民粹政党反精英的、本土主义的实用经济主张,因为这直接对应了危机期间欧盟委员会以超国家的方式在欧盟层面进行的经济利益协调与分配。^① 在本轮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批判既有的欧盟政策在绿色新政、俄乌冲突与新冠疫情后财政纪律等方面均违背了“本土生产者应当享有其经济成果”的理念。

具体来说,在绿色新政议题上,左翼与主流政党倡导的《欧洲绿色协议》强调通过一系列气候、能源、交通和税收等组合政策,确保欧盟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② 右翼民粹政党一方面强调这一决策是由“欧盟精英”作出,另一方面强调这一协定将对农村地区及依赖化石燃料的地区造成不公平的损害。事实上,农村地区与更为依赖化石燃料的地区往往与欧盟内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边缘地区重合,而既有研究表明边缘地区的选民更有可能产生“地区怨恨”进而支持右翼民粹政党。^③ 近期欧洲范围内大规模兴起的农民抗议运动也表明右翼民粹政党正在利用城乡差距,宣传《绿色协议》对农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此进一步动员农村选民。^④ 此外,这也与纵向上的负面感知相叠加。右翼民粹政党强调这一协定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批判对化石燃料体系进行重大变革可能带来失业率上升、生活质量下降等风险。^⑤

在俄乌冲突议题上,欧盟国家的经济压力不仅来源于无可避免的能源价格上涨,还来自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例如,德国与乌克兰于 2024 年 2 月签署长期双边安全协议,其中规定德国将在 2024 年向乌克兰提供超过 70 亿欧元的军事

① Boris Popivanov, “Putting the Blame Back on Brussel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of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in the 2019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5, No. 1, 2024, pp. 54 ~ 68.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en.

③ Sarah De Lange et al., “Regional Resent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ural or Peripheral Phenomenon,” *Regional Studies*, Vol. 57, No. 3, 2023, pp. 403 ~ 415; Anders Ejrnæs et al., “Introducti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Discont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31, No. 6, 2024, pp. 1465 ~ 1493.

④ Christina Lu, “Europe’s Farmer Protests are Part of a Bigger Problem,”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2/20/europe-farmers-protests-climate-eu-green-deal/>.

⑤ Karin Thalberg et al.,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in the Face of Rising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January 31, 2024, <https://institutdelors.eu/en/publications/the-european-green-deal-in-the-face-of-rising-radical-right-wing-populism/>.

援助。而此前,德国已向乌克兰捐赠超过 170 亿欧元。在欧盟层面上,将欧洲和平基金的上限进一步提高则意味着成员国将进一步捐款缴纳。^①与之相对,右翼民粹政党认为本土生产者无法享受这一收益,拒绝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②事实上,执政与在野的右翼民粹政党均没有能力改变欧盟对俄乌冲突的整体基调,而俄乌冲突在其竞选中更多是被工具性地用于强化负面的经济感知。^③

此外,就新冠疫情后的财政政策而言,右翼民粹政党都寻求更有利于本土的欧元债务发展方向,支持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有更大决策主权,并根据本国情况提出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主张来吸引本国选民。例如德国选择党延续了德国一贯的财政鹰派主张,其 2024 年竞选宣言提及了该党脱离欧元区并重新引入德国马克的立场,批评“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以及任何通过发行共同债务来实现泛欧盟目标的政策行为。^④与之相反的是,意大利兄弟党与北方联盟党则主张尽可能放松对成员国的财政限制,充分利用债务筹集资金以完成意大利的经济复苏。^⑤右翼民粹力量在各国内部的不同实用主义主张,也进一步凸显了经济议题中横向的分配难题与右翼民粹政党对其机会主义地利用。

(二) 社会撕裂:叠加身份认同与社会福利的移民叙事

部分媒体认为根据欧洲晴雨表的调查结果,在促使欧盟公民投票的因素中,移民与庇护问题仅排在第五位,依次位于物价上涨、经济形势、社会福利和国际形势之后。^⑥但是一方面,欧洲议会选举事实上由 27 个独立的国家选举构成,而

① Tamás Orbán, “EU Military Aid for Ukraine Held Up by Germany and France,” *The European Conservative*, February 21, 2024, <https://europe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news/eu-military-aid-for-ukraine-held-up-by-germany-and-france/>.

② Luigi Scazzieri,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 A Sharp Right Turn,” April 30, 2024, https://www.cer.eu/sites/default/files/insight_LS_elections_fin_30.4.24.pdf.

③ Sergey Shein et al., “Towards a Common Vision?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Positions on the EU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Rus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 32, No. 1, 2024, pp. 291 ~ 300.

④ AfD, “Program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für die Wahl zum 10.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March 6, 2024, <https://www.afd.de/europawahlprogramm2024/>.

⑤ Philip Rathgeb, “United in Diversity: The Economic Policy Platforms of the EU’s Far Right,” *Intereconomics*, Vol. 59, No. 2, 2024, pp. 66 ~ 69.

⑥ European Parliament, “EU Post-electoral Survey 2024,” October 25, 2024,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3292>, p. 29.

移民问题在德国、奥地利等右翼民粹政党崛起成员国的重要性极为突出,仅稍逊于物价上涨。^① 在德国内部,更受移民问题困扰的东部地区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显著高于西部地区。^② 另一方面,右翼民粹政党把移民问题与社会福利、国际形势与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对移民议题进行了工具性地利用,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移民议题的考察价值。

在移民议题上,主流政党大多采用了包容性策略,吸纳部分右翼民粹立场以挤占其政策空间并扩大自身选民基础。^③ 这在欧洲人民党主导通过的《移民与庇护协议》中可见一斑。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主流政党的包容性策略成果有限,反而会促进右翼民粹政党的言论和立场合法化、主流化,消除既有的政治禁忌,并使得选民在此类右翼民粹政党占优势的议题上投入更多注意力,从而促进右翼民粹政党的进一步崛起。^④

202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遵循着这一观点。在巴以冲突加剧欧洲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右翼民粹政党在此前的政策主张上进一步延伸,深挖移民议题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叙事与社会福利叙事,并将其塑造为主流政党失败的象征,在本轮选举中成为动员选民的有力工具。

具体来说,尽管欧盟在整体上强调巴以冲突中“两国方案”的重要性,但欧盟内部对政策偏好的争论从未停歇。在国家层面,爱尔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强调人权价值,立场向巴勒斯坦倾斜;法国、西班牙等国注重维持与两国平衡和良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EU Post-Electoral Survey 2024,” October 25, 2024,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3292>, p. 29.

② Kai Arzheimer, “The Far-Right’s Success in the 2024 European Election in Germany — What does It Mean, and What is Its Impact,” June 26, 2024, <https://www.populismstudies.org/the-far-rights-success-in-the-2024-european-election-in-germany-what-does-it-mean-and-what-is-its-impact/>.

③ Bonnie Meguid,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3, 2005, pp. 347 ~ 359; Tarik Abou-Chadi, “Niche Party Success and Mainstream Party Policy Shifts—How Green and Radical Right Parties Differ in Their Impac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No. 2, 2016, pp. 417 ~ 436; Tarik Abou-Chadi and Werner Krause, “The Causal Effect of Radical Right Success on Mainstream Parties’ Policy Positions: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3, 2020, pp. 829 ~ 847.

④ Antonia May and Christian Czymara, “Careless Whisper: Political Elite Discourses Activate National Identities for Far-Right Voting Preferenc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30, No. 1, 2024, pp. 90 ~ 109; Werner Krause et al., “Does Accommodation Work?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ies and the Success of Radical Right Partie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 11, No. 1, 2023, pp. 172 ~ 179.

好的关系；德国、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则由于战争历史或现任政府等因素向以色列倾斜。^① 在成员国内部，巴以冲突加剧了欧洲社会犹太裔和穆斯林群体的文化冲突对抗，激活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引发关于国家身份认同、移民和极端暴力的争论，^②支持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示威活动频繁发生，且往往伴随着暴力冲突和警民对峙。欧盟内部的分裂为右翼民粹政党动员本国选民的民族主义叙事提供了重要的土壤。

在此背景下，右翼民粹政党的策略是一方面将文化作为一个身份价值问题，并以意识形态为由为排斥移民行为辩护；另一方面关注社会福利，并强调福利沙文主义。^③ 就价值叙事来说，右翼民粹政党提供的民族主义解决方案直面欧洲当下身份认同缺失的困境。德国选择党的选民向媒体表示，这不仅是移民问题，而更“关乎传统，关乎对祖国的忠诚”，他表示“德国人已经沉迷于纳粹和大屠杀，尽管这只是历史的很小一部分”，这令他“难以感受到健康的爱国主义”。^④ 这一基于民族文化的身份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西方选民的社会身份正普遍从阶级身份向文化身份转移，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底层选民从左派转向右派。^⑤ 就福利叙事来说，强调民族主义意味着将部分少数群体排除在可获得福利的范围之外。事实上，这两种叙事总是结合在一起。身份价值叙事吸引着人数较少的、右翼民粹政党最坚定的核心选民；社会福利叙事则吸引着人数较多的、较为流动的边缘选民，而右翼民粹政党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便取决于其将这两者结成

① Sinem Akgül-Acikmese and Soli Özel, “EU Policy Towards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The Limitations of Mitigation Strategie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9, No. 1, 2024, pp. 59 ~ 78.

② 伍慧萍：《欧洲右翼极端和民粹政党的发展动向及影响》，《当代世界》2024 年第 3 期，第 66 页。

③ Daphne Halikiopoulou and Tim Vlandas, “Understanding Right-wing Populism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2022,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wien/19110-20220517.pdf>, p. 13.

④ Guy Chazan, “How the Far Right is Winning over Young Europeans,” *Financial Times*, May 29,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e77e1863-5a78-4d16-933c-6a665a66f261?desktop=true&segmentId=7c8f09b9-9b61-4fbb-9430-9208a9e233c8#myf%E2%80%A6>.

⑤ Francesco Pasetti, “Migration, Elec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f Tomorrow,” May 25, 2024, https://www.cidob.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5/25-30_FRANCESCO%20PASETTI_ANG.pdf; Nicola Gennaioli and Guido Tabellini, “Identity Politics,” June 2024, <https://repec.unibocconi.it/igier/igi/wp/2023/693.pdf>.

利益联盟的能力。^①

(三) 社交媒体:政治不满的放大器

经济衰退、移民危机、地缘政治和生态转型等问题成为了所有年龄段选民普遍焦虑的来源。但值得关注的是,右翼民粹政党提供的解决方案在青年人中的吸引力大幅增加;而青年人一度被认为对“保守”的方案毫无兴趣。本次大选中,尽管主流青年选民仍倾向于支持在气候、性别、移民等问题上更为进步的左翼政党,但右翼民粹政党通过贴近青年的宣传渠道与直面焦虑的政策方案成功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青年选民。换言之,社交媒体成为了右翼民粹政党在青年人当中放大经济负面感知与社会价值撕裂议题影响力的倍增器。

一方面,互联网媒体的草根性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精英叙事不谋而合,右翼民粹政党相对熟练地掌握了青年人喜欢的沟通渠道,即照片墙、TikTok 和油管等社交媒体和视频应用程序。既有研究已反复论证右翼民粹政党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的专长与优势,包括但不限于绕过主流媒体的审核、大规模传播煽动性信息、建立拥有共同身份认同的社群。^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流行的现代媒体也已被证明为是传播激进思想的重要工具。20 世纪 20 年代初,纳粹政党先后利用广播与电影作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渠道;今天的右翼民粹政党则更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来迎合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习惯。^③ 例如,油管网红阿尔维斯·佩雷斯创立了西班牙极右翼政党“派对已结束”党且该党在本轮选举中获得 3 个欧洲议会席位。他挑战了传统政党宣传的形式,几乎只在照片墙和“电报”上发布其反移民和反腐败的宣传内容,但获得了 6.7% 的青年选票;这一比例高于其在

① Daphne Halikiopoulou and Tim Vlandas, “When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ests Align: the Anti-immigration Voter Coalitions Driving Far Right Party Success in Europe,”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2, No. 4, 2020, pp. 427 ~ 448.

② Benjamin Krämer, “Populist Online Practices: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net in Right-wing Populism,”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20, No. 9, 2017, pp. 1293 ~ 1309; Jonas Kaiser, Adrian Rauchfleisch and Nikki Bourassa, “Connecting the (Far-) Right Dots: A Topic Modeling and Hyperlink Analysis of (Far-) Right Media Coverage during the US Elections 2016,” *Digital Journalism*, Vol. 8, No. 3, 2019, pp. 422 ~ 441; Azade Kakavand, “Far-right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in the Light of Technology Affordanc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48, No. 1, 2024, pp. 37 ~ 56.

③ “Why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have a Greater Reach,” March 11, 2024, <https://www.klicksafe.eu/en/news/warum-rechtspopulisten-reichweitenstaerker-sind>.

所有年龄段选民中获得的总选票获得率 4.6%。无独有偶,在 TikTok 上表现突出的西班牙右翼民粹政党“呼声”在 25 岁以下人群中获得了 12.4% 的选票,而其总体支持率为 9.6%。^① 在对欧盟各成员国国内政治广告支出最多的政党进行排名时,前十个国家中有七个是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其中匈牙利青民盟遥遥领先,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兄弟党和西班牙“呼声”党紧随其后。^②

另一方面,右翼民粹政党抓住了欧洲年轻人对国家现有发展轨迹的不满和对未来发展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在社交媒体算法的加持下更容易被放大和利用。事实上,前述经济感知问题与社会移民问题在青年人身上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德国,绿党在青年选民中损失了 23% 的选票,这是由于青年群体意识到绿党并没有实现其在上一轮选举中的承诺,其现有发展轨迹亦对青年人没有太大帮助。^③ 在气候议题上,德国选择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赫向媒体表示,左翼正在推行“去增长”议程,基本上就是向青年人宣扬他们将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穷,并告诉他们必须做出自我牺牲才能拯救气候。^④ 在德国青年年度调查的最新一期中,右倾现象也清晰可见,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正在为更多现实问题所取代。在移民议题上,法国国民联盟议员亚尼斯·瓦达表示,该党最吸引学生的口号之一便是反移民,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与新移民争夺住房等福利。^⑤ 右翼民粹主义在本轮选举中对上述议题的关注,与其对社交媒体的更好利用,共同放大了其在青年选民中的影响力。右翼民粹政党的反对力量甚至表示,右翼民粹政党正在通过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碎片控制更容易被操纵的青年人。

① Sarah Marsh et al., “How the Far-Right Gained Traction with Europe’s Youth,” Reuters, June 13,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how-far-right-gained-traction-with-europes-youth-2024-06-13/>.

② Clothilde Goujard et al., “Orbán Leads the Way in EU Election Advertising,” Politico, June 2,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election-political-ads-spend-online-meta-google-fidesz/>.

③ Matt Fpatrick, “Why are Europeans - Including the Young - Being Pushed to the Far Right,” The Conversation, June 14, 20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are-europeans-including-the-young-being-pushed-to-the-far-right-232253>.

④ Guy Chazan, “How the Far Right is Winning over Young Europeans,” Financial Times, May 28,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e77e1863-5a78-4d16-933c-6a665a66f261?desktop=true&segmentId=7c8f09b9-9b61-4fbb-9430-9208a9e233c8#myf%E2%80%A6>.

⑤ Nicholas Vinocur and Victor Goury-Laffont, “Europe’s ‘Foreigners Out!’ Generation: Why Young People Vote Far Right,” Politico, June 17,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ar-right-europe-young-voters-election-2024-foreigners-out-generation-france-germany/>.

三、欧洲右翼民粹崛起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随着欧盟政治生态的右转,欧盟内部政治图景也面临重构,这将深刻影响欧盟内外政策走向。^① 对于中欧关系而言,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其议程和主张也将越来越多地嵌入欧盟及成员国对华政策中,给中欧关系带来复杂的影响。一些成员国可能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如匈牙利的“向东开放”政策,而另外一些成员国则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立场,如意大利梅洛尼政府退出“一带一路”倡议。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本国优先”的立场,在经贸领域更倾向于奉行狭隘的保护主义政策,这可能使中欧经贸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背景下,欧洲右翼民粹政府可能会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对华关税、贸易等问题上向欧洲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对当前的中欧关系而言,欧洲右翼民粹的崛起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其一,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可能会削弱欧盟统一对华政策和经济安全战略。右翼民粹政党主张本国利益优先,追求功利性的民族国家利益,反对欧盟权限的扩张与对国家主权的控制。右翼民粹政党正在欧洲内部对欧盟既有政策进行变革,对欧盟在难民、气候变化、对乌援助以及对华政策等领域构成挑战。目前,欧盟正在推动成员国落实以“去风险”为主基调的对华政策。2024年1月24日,欧盟委员会刚刚出台了落实《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一揽子计划,进一步强化外资审查、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以及所谓提高研究安全性,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这些举措最终需要由成员国落实,而欧盟委员会在这些领域的扩权一旦损害成员国利益,右翼民粹政府可能以维护主权的名义加以抵制,《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落实也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

例如,在欧盟2023年提出的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中,匈牙利和斯洛

^① 金玲:《欧洲议会选举后的政治图景重构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7期,第95页。

伐克的右翼民粹政府便基于本国利益投下了反对票。匈牙利认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税将是有害和危险的,不仅将扼杀欧洲经济的未来竞争力,也可能引发与中国的“经济冷战”。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彼得呼吁更多欧盟成员采取更加理性的政策,更多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而非屈服于主流的压力。^① 作为欧洲重要的传统汽车生产国,斯洛伐克面临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挑战,而吸引中国投资是其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重要一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曾表示中国的电动汽车比斯洛伐克领先了 20 年,关税和贸易战最终对欧洲自身造成的伤害可能大于中国。^② 因此,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在新能源汽车关税问题上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尽管这并不能改变最终结果,但仍然削弱了欧盟委员会在这个议题上得到的支持度。

其二,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内部,各党派政治纲领差异较大,尚未形成统一的对华议程。除了捷克之外,在目前欧洲的选举政治当中,中国并未成为不同政党之间竞逐的一个显著议题。因此,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选举中打“中国牌”的现象也不明显。在欧洲议会党团层面,包含右翼民粹力量的欧洲爱国者党团、欧洲保守与改革者党、主权欧洲国家党等党团都没有将中国列入重点关注议题。

此外,欧洲右翼民粹对华态度和立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不同成员国之间,也体现在同一个成员国的不同右翼民粹政党之间。例如,匈牙利的青民盟在欧尔班的领导下,采取了亲华政策,积极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2024 年 5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匈牙利,两国建立了“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也与欧盟对中国的“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竞争对手”三重定位截然不同。^③ 相反,法国的国民联盟则持反华立场,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并表示中国

① “Hungary to Vote Against EU Punitive Tariffs on Chinese Cars,” Hungary Today, October 3, 2023, <https://hungarytoday.hu/hungary-to-vote-against-eu-punitive-tariffs-on-chinese-cars/>.

② “EU’s Protectionist Tariffs on Chinese EVs Face Backlash from Industry, Officials”, China Daily, October 30, 2024,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410/30/WS6721dd9fa310f1265a1ca7d0.html>.

③ Andrew Higgins, “In Budapest, Xi Hails China’s ‘Deep Friendship’ With Hungary,” The New York Times, May 9,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5/09/world/europe/xi-jinping-china-hungary-orban.html>.

正在通过大量的国家补贴与欧盟进行着“不公平”的贸易。^①再例如,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倾向于与中国发展相对友好的关系,一度主导了意大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②而北方联盟党则对中国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担心中国在欧洲的经济扩张可能带来负面影响。^③这种内部差异凸显了中国有与不同右翼民粹政党发展不同关系的空间。

其三,右翼民粹政党总体上相对务实,体现出机会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同其它民粹主义一样,极右翼政党通过民粹主义的手段而非诉诸意识形态来吸引大众的支持。右翼民粹政党需要炒作能吸引选票的议题而上位,而大众关切的议题总在变化之中,因此,右翼民粹政党的政策立场是相对灵活的。在经济层面,在对华关系上,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总体上更加关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其对华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中国投资与贸易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经济实用主义色彩。在政治层面,比起一边倒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传统主流政党,欧洲的右翼民粹政党往往更注重发展平衡的国际关系,寻求多元的合作伙伴,获取更为自主的国际地位。^④2024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访华期间,中国与斯洛伐克发表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斯洛伐克表示将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欧班列合作,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为中国企业及货物通过斯洛伐克进入欧洲市场提供便利。此外,斯洛伐克也表示愿意加入“和平之友”小组,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贡献力量,这些都是斯洛伐克奉行务实经贸政策和独立外交的表现。

① Leigh Thomas, “French Far-Right’s Finance Point Man Promises Fiscal Restraint, Pro-Business Stance,” Reuters, June 24,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french-far-rights-finance-point-man-vows-fiscal-restraint-pro-business-stance-2024-06-24/>.

② Xixi Hong, “Italy Changes Track: From the Belt and Road to (Re)Alignment with Washington,” December 20, 2021, <https://www.iai.it/en/pubblicazioni/italy-changes-track-belt-and-road-realignment-washington>.

③ Giovanni B. Andornino,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aly-China Relations: From Economic Pragmatism to Selective Followership and Back,” in Simona Grano and David Wei Feng Huang, eds., *China-US Competition: Impact on Small and Middle Powers’ Strategic Choic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pp. 133 ~ 157.

④ Malgorzata Jakimów et al., “Does Populism Matter in EU-China Relations? The Cases of Italy and Czechia,”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63, No. 1, 2025, pp. 89 ~ 107.

四、结 语

在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国右翼民粹政党整体崛起,获得了更多议会席位并促成主流政党吸纳了自身主张,将其策略转变为在欧盟内部改造欧洲,并采用了跨国合作的方式来推进各自强调本国利益的政治主张。究其原因,在经济方面,右翼民粹政党更多地关注相对的经济感知,提出符合本土利益的务实且功利的经济政策,同时反对主流政党在绿色新政等议题上的立场;在社会方面,在巴以冲突加剧了欧洲社会分裂的背景下,进一步挖掘移民政策背后的文化身份和社会福利叙事;在策略方面,通过巧妙运用社交媒体并回应青年焦虑,成功提升了在青年选民中的支持率。

随着欧盟政治轴心的整体“右转”和右翼民粹主义的“主流化”,欧盟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如何与欧洲右翼民粹力量打交道成为中国对欧政策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尤其如果右翼民粹主义在 2027 年赢得法国大选,那么右翼民粹在欧洲可能由“量变”进入“质变”的阶段,中国对欧政策也将面临新的现实。

因此,中国不能停留于被动和策略性地应对欧洲右翼崛起,而须在系统评估欧洲右翼民粹影响的基础上,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提出与欧洲右翼民粹力量交往的顶层规划。欧洲右翼民粹力量的崛起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经济贸易平衡问题依旧,但其整体上仍可能给中欧关系带来积极的变化,最核心的原因是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纲领是实用的,能够同中国拓展实际的利益合作,发展灵活的伙伴关系。因此,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也为中国的对欧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增强灵活性,独立看待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避免将其看作中美关系或中俄关系的附属,精准把握欧洲方面的立场与诉求,在务实合作中促进共同发展。